



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

大革命时期党在广东创办的农军干校

□ 李健行

1926年4月，在广东顺德凤山东麓的西山庙三元宫，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了一所专门教育和培训农民自卫军骨干的学校——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农军干校）。农民自卫军（以下简称农军）是党领导的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反动势力、保护人民利益的武装队伍。在接近一年的办学历程中，农军干校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为推动当地农民运动发展走向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在培训地方农军干部方面较早的探索和尝试。

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的成立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1924年，广东农民运动方兴未艾，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军。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顺德县支部成立后，顺德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当时顺德县内的反动民团、土匪、劣绅相互勾结，摧残农民协会、残害农民，农民协会急需壮大自己的武装来对抗反动势力、保护农民利益。随着农军队伍不断发展扩大，亟需大批军事干部担任指挥和训练工作。

在顺德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际，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强调武装工农的重要性，从黄埔军校抽调60名共产党员、军事骨干派往广东各地训练农民武装，发展农民运动。

1925年5月间，中共广东区委派铁甲车队（由中共广东区委组建的革命武装部队）大队长徐成章到顺德视察农军工作。徐成章了解实际情况后，对农军问题作出指示，要中共顺德县支部建立一所农军干部学校，将全体农军分期分批进入学校集中学习和训练。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培养农军骨干，保卫新生的农民协会，中共顺德县支部接受了这个建校任务，并与县农会于1926年4月决定，学习借鉴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及军事训练理念，在顺德西山庙内的三元宫开设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培训农军骨干，



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旧址

5月正式开课。由中共广东区委派来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共产党员詹宝华担任校长，黄埔军校毕业生韦崇纲等为军事教官，以三元宫为校本部，训练县内各地农军骨干，学员学习时间为3个月一期，共办6期。第一期招收学员分4个班，每个班60人。

农军干校注重对学员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致力于把学员培养成既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又有较高的指挥、作战能力的革命骨干。课程主要侧重于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课主要内容是讲述中国目前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国际大事分析、中国革命战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农军纪律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授使用武器、排列各种队形、进攻敌人、布防和撤退，侦察敌情、拟定作战计划等内容。

因师资紧缺，校长不仅负责学校全面工作，还担任军事训练教官，与学员同食宿、共训练。农军干校的军事训练十分紧张，每天三次军事操练、两次文化课学习，还经常组织学员进行野外演习，通过在风雨中的摔

打滚爬，培养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同时，非常注重抓好学员中的党建工作，将出色的农军骨干发展成为党员。在既严格又具有针对性的训练下，学员们的军事政治素质快速得到提高，很快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担负起全县农军总后备队的战斗任务，经常开赴顺德县各区、乡，支持工农革命斗争。同年冬，又在相距不远的陈村增设农军干校三区分校，把全县的农军干部培训工作推向高潮。

学员们毕业后回到各区、乡成为农民运动骨干，对在农军中普及军事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培养协同作战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农军干校还协助建立了顺德县农民自卫军基干队。至1926年10月，顺德县已有区农会8个，乡农会125个，农协会会员4万多人，训练有素的农军1万多人。农民运动取得巨大发展。

各乡农民在农会支持下，抗缴各种捐税及护沙涌费，引起地主土豪的不满。他们阴谋串通土匪武装，制造

事端，打击农会。1927年2月4日，二区农民协会在熹涌举行开幕兼授旗典礼，农军干校和县农会、各乡农会到场祝贺。就在此时，古楼二十二乡民团出动数百人乘虚进袭新滘农会，并在新滘口村大肆烧屋抢劫，使村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聚集在熹涌的各路农军接到告急通知，立即散会驰援。在对敌战斗中，詹宝华不幸中弹牺牲。在教官们的指挥下，学员兵经过英勇奋战，最终将顽敌击溃。

詹宝华牺牲后，县农会召开农会代表会议，准备调集全县农军一举摧毁古楼堡的封建堡垒。适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决战被迫中止。4月15日晚，农军干校陈村分校共产党员30余人被捕入狱。

在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中，农军多次奋起抗击，无奈敌强我寡，28人壮烈牺牲。在白色恐怖中，不少共产党员被杀害、被通缉追捕，党组织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党员被迫疏散各地隐蔽，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农军干校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活动。

在接近一年的办学期间，农军干校共培训了干部300多人，这批干部既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又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推动工农运动发展和捍卫基层革命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岁月流转、时光远去，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这段红色历史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顺德农民自卫军干部学校旧址于1994年被确定为佛山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5年旧址陈列馆建成后，于2010年被确定为顺德区党员教育基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都在这里接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



来到陕西韩城，不能不拜谒一座祠和一座墓。墓的主人是司马迁，祠就是为纪念他而建。

夏日的关中大地，有些闷热，可进入祠墓景区，却立感到一阵清凉，尤其司马古道两旁，松柏苍翠，透来丝丝凉爽的风。这条古道春秋战国时就有了，是当时通向长安的要道，路面风雨洗刷、突兀不平的巨石，证明着它的古老。

祠和墓的具体位置在古道旁的高岗上，略显陡峭。我们沿石阶而上，躬背前行，在通往顶端的途中，先后走过上书“高山仰止”“史笔昭世”“龙门才子故里”“河山之阳”的四座牌坊，便到了司马迁墓前。

墓家所在是个院落，两株高大古柏遮挡了云日，让院内显得凉爽静穆。一座供祠立在那里，里面是一尊司马迁全身塑像。供祠后面即为司马迁墓家，它呈圆柱形状，隆起的土堆上面长着巨大的分叉古柏，嵌入墓家的墓碑上刻有“汉太史司马公墓”字样，十分醒目。

驻足在司马迁墓家的旁边，一行的我不禁感叹：这就是《史记》的作者——伟大的司马迁啊，他此刻和我们是如此接近！煌煌五千年华夏史，是他记载了三千多年，如果没有这位先人，不知我们这些人将怎样去回望历史。眼前的情景，引发了我对历史的遐思。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年幼时即随父亲习字读书，十岁已能诵习《尚书》《左传》等书，受太史令父亲的训导，二十岁时又开始游历天下，遍访河山搜集古人古事、旧闻逸事，那个时期的司马迁，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并已立下修史志向。如果没有中途变故，他也一定会继续做太史令，记述前朝历史，成为一个不错的历史学家。

但中途发生的李陵之祸，极大地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太史令当不成了，以这一身份去正常记述历史干不成了。在那个时候，遭受官刑之人，生前遭人歧视、死后不能入祖坟，背负着这样的屈辱，活下去都无比的艰难。但是，司马迁没有选择沉沦，没有选择厌世，而是忍辱负重，以另一种顽强执着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夙愿，最终向后人奉献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制，并以此成就了自己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到底靠什么力量做支撑，是来自对父亲的孝道？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讲述了对父亲说过的话：我们的祖先本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世就取得过显赫功名，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如今汉朝兴起，海内一统，贤明君主、忠义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论载，中断了国家历史的记载，对此我心里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也曾流泪答复父亲：小子虽然不敏，但父亲的话我记下了，我一定要把父亲编纂历史的愿望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失。承诺的事情必须兑现，否则就是对父亲的不孝，也许就是这“孝之大者”，成了司马迁仍要立志修史的一大精神动力。但是我又感到，司马迁最大的力量最终还是来自他自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志向支撑着他。他从历史上那些忠臣圣贤那里汲取了

拜谒司马迁

□ 王会杰

巨大的榜样力量，他在痛彻吟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就是司马迁，他以不屈的精神向命运顽强抗争，终成为辉耀古今的史学大家，他的人格精神和他的作品一样具有永恒的魅力。

想到这里，望着司马迁墓家，我又增添了更多的崇敬之情。《史记》是在记述历史，可他不是简单地因循旧例、中规中矩，而是将《史记》写成了史诗。这部史诗，既为皇帝树碑，又为凡人立传，只要他们对历史有大的影响或贡献，就可以进到他的《史记》中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彪彪赞扬其文采，“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固赞其史学家的本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观念和意识。

记得刚进墓家景区时，迎面前场地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司马迁塑像，只见他眺望北方，目光中似有巨大而焦急的期盼；又想起供奉祠里他的雕像，也是这样面向北方，神情与这尊十分相像。人们说，他是在焦急地期盼着那个降将李陵的归来，如果李陵以汉将的身份得胜归来，那么，司马迁身上的所有冤屈、耻辱，也将随之被洗刷。但是，我想这一切都已不重要，因为太史公的精神和他的《史记》已流传千古，并将继续流传和承继下去，它们将胜过一切。

你看，“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刻着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题诗的石碑就在太史公的殿前，这题诗代表着后世对司马迁一生的至高评价。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

司马迁祠最高台阶的院内那两棵高大的古柏，它们枝繁叶茂，遮蔽了云日。站在院内远望，古老的黄河向南流去，两岸生机勃勃，一派繁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我的思绪亦随之而飞驰。



老物件“窝积”拾忆

□ 潘春华

近日，在苏州市吴江区黎里六悦博物馆参观时，我见到两卷陈年老旧的“窝积”，不禁勾起对这一老物件的回忆。

“窝积”，又称“窝集”，是旧时一种用芦苇手工编制而成的、用于储存粮食的长条形、便于窝藏的器物。宽约35厘米，长10—15米不等，以老壮芦苇压扁后斜十字花纹织编，通体芦苇，没有任何辅材，具有良好的透气保温和防雨性能。成品“窝积”卷成一盘，以绳扎之，铺开则为一字阵，盘卷则成窝状，窝内堆积稻、黍、稷、麦、菽等五谷粮食，故称“窝积”。

旧时，江淮地区的粮行、粮站以及富裕人家通常都没有粮囤，用“窝积”囤储粮食。作家汪曾祺在小说《大淩记》中说，巧云的父亲黄海蛟是个挑夫好手，“他专能上高跳。这地方大粮行的‘窝积’，高到三四丈，只支一只单跳，很陡”。他在《八千岁》里也写道，“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儿里。他家仓廩里有堆稻的‘窝积’挤得饱满，每一积都堆到屋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镇江沿长江一带的江淮盛产芦苇。端午时节，江淮上连片生长的芦苇绿浪翻滚，人们便利用退潮，蹬着浅水去江淮中打芦叶（镇江人俗称粽叶），回去包粽子过端午节。深秋，大雁南飞，江淮上的青纱帐变成了黄金坝，芦叶枯槁，芦花飘飞，芦秆挺立时，便是芦苇的收获季节。这时，农田里的粮食大都收获归仓了，生产队就晴耕好天气安排芦农们去江淮割芦苇。

“窝积”是芦苇的“子孙”，芦苇是文雅的叫法，镇江人则习惯称之为芦柴。所以，割芦苇又叫割芦柴。镇江的江苇，由于受长江水的滋养，皮壳厚、身秆高、韧性强、节疤少、颜色润，质量上乘。芦柴有“大柴”与“小柴”之分，“小柴”如小手指般粗细，质地坚韧，表面光滑，一般用于做芦帘。“大柴”的植株有三四米高，直径比大拇指还粗，秆株直立，是打芦席、做“窝积”的上好材料。收割时，芦农们通常将割下的芦柴粗略分类，挑选一些粗壮的“大柴”，留着打芦席、做“窝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割芦柴必须将镰刀磨得锋利，还得另备一把钝刀。“窝积”制作工序颇为讲究，是一项技术活。选好笔直、粗壮的“大柴”，然后用刀将其从头到尾剖开一条缝，依次铺在地面，用石滚子将其反复碾压成芦篾，再从梢向根部依次刮去芦皮。打“窝积”时，需跨坐在一个前低后高的矮长木凳上，将芦篾摆成十字起头，采用织补的技法，不断依次交叉加篾编织，用双手将芦篾推紧挤密，“煞边”收口如若不服帖，就用钝刀将之敲平。

由于镇江产的芦柴质量好，加上制作的“窝积”工艺好，花纹紧密、边角整齐、内外光滑，中看且中用，因此成为镇江周边金坛、溧阳、溧水、宜兴、句容、高淳等地客户的抢手货，甚至卖到山东、安徽各地。那时候冬春季节，柴草行也雇工专做“窝积”，一个熟练芦工，通常一天能打五花五丈“窝积”2盘，每盘收购



价1元2角6分。

然而，打“窝积”是既苦又累的活计，旧时芦农曾流传一首民谣：“骑木凳，打‘窝积’，弯腰驼背忙不歇。双手刺得血滴滴，咬紧牙关不能息。”记得我小时候，家乡闹市五条街附近的中街与第一楼街之间的一段空地上，有一家柴草行，大门口堆满了一捆捆芦柴。我常去柴草行买柴火，便见到芦农们在打芦席、做“窝积”，虽是寒冬腊月，他们仍在室外作业，冻得双手皆是裂口，十分辛苦。

参加工作后，有一次我出差到河南开封，看到那里也产“窝积”，感到非常亲切。只是当地叫法不同，叫它“茨子”“囤席”“趂子”等。后来发现长江以南很多地方也都生产和使用“窝积”。只是有的地区不止用芦苇，还用高粱秆来制作，产品功效也不错。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前，这是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用来储存粮食的农具了。

如今，家乡广袤的沿江芦滩湿地变为了一个个高楼林立的居民小区，芦席、“窝积”都早已没有了踪迹，我小时候家门口那一眼看不到边的芦苇荡和漫天遍野的芦花也成了内心深处永恒记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衣食住行中的劳动工具和产品也越来越现代化，很多老物件都因失去功用而淡出市场。但是这些老物件是历史的见证，它与农业民族的手工劳作时代密切相连，曾经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镌刻着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见证着历史发展的变迁，凝结着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成为带有历史基因的“文物”。

